

# 科学理解科学发展观

姚润皋

十八大最具里程碑式意义的创新就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增加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也就是说,党的十八大决定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使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紧密结合起来的坚定立场、优良传统与创新品格,通过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明确界定而获得了生动的体现。科学理解科学发展观,深入领悟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一、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论述

当前,要做到科学理解科学发展观,最切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认真研读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为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十八大报告以简明、精炼的语言,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为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思考的线索。

我认为,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主要围绕着五个方面的关系展开。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就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科学发展观既是党带领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

的一系列问题而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成果,同时,也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十八大报告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它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从时间和空间、广度和深度等方面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认识道路,而且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具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它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些论述表明,科学发展观产生、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来自新形势下的新的实践,而新形势下新的实践所凸显的“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深层次问题。科学发展观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些



问题,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和深刻揭示;运用这些规律性的认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可以在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关于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十八大报告凝练为一句话精辟地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概括生动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它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实践开拓与理论创造,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性事业,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为科学发展观具有价值正义性、理论科学性、实践进步性,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提供了根本的主体保证。

关于科学发展观理论内部的关系。报告认为,科学发展观是由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的理论体系;它的最核心的观点是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它的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就意味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观点不是零散的、无序的,而是这些观点按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本身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有机地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发展观与历史观、真理观与价值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结合和统一。

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上述五个方面的论述,分别涉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实践基

础、现实主题、主体动力、哲学前提、核心观点和内在逻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论述是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依据。

## 二、科学发展观理论构架设想

要做到科学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构架有比较明晰的认识。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带有真理性认识的理论体系,都必定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备的结构,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不是毫无来由的主观想象,而是由我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尤其是2003年“非典”疫情的发生和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突出问题的显现,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发展目的、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主题、发展布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于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理念、新思路应运而生。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观点表述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此时,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得到拓展与深化,这些观点大致勾画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间,党带领人民通过对新鲜实践经验的概括升华,分别在不同领域将科学发展观的相关思想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将科学发展观的有关论述转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政策、思路和举措,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提升干部自觉实践和驾驭科学发展的能力与素质。可以这样说,经过十多年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活动的循环往复,科学发展观已经以体系化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成为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我们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取得的最新认识成果。在我看来,这一成果的理论构架至少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着力回答和解决的实践主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一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有四个,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上述四个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均含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方向性,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可以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顺利发展提供思想、制度和组织上的保证。因此,其落脚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全方位地解决发展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决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所谓“中性”的问题,而是把发展的普遍性意蕴与特殊性内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局性问题。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十八大报告把这十六个字概括为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理论基础。就上述十六个字构成的四个词之间的关系而言,实事求是核心,它既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认识路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均是针对人们的思想变化不能与时代或形势的发展相同步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要求。前者要求人们的思想从某种不合时宜的教条或制度的桎梏与束缚中挣脱出来,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后者则要求人们不要在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下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从而使思想认识滞后于形势的变化。因此,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与时俱进,其根本要求仍然是实事求是。至于求真务实,不仅仅是作风上的要求,更是对实事求是的发展。正如胡锦涛所说:“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原则是:统筹兼顾。如果用更加详细、具体的语言来说,这一方法论原则就是:“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

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就哲学意义而言,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在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关系中,不能把矛盾的一方消灭、代替另一方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而是应当允许矛盾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每一方均在最适合自己存在与发展的轨道上运行,从而双方形成促进矛盾统一体进一步成长发展的合力。这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晚年“斗争哲学”的反思与扬弃。之所以要这样做,最根本的依据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成为党和国家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最高宗旨。

第四,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价值观和政治观是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战略观是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世界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民主观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者统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文化观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观是促进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构建美丽中国,保证中国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党建观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些主要观点既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质,又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撑点。

第五,科学发展观理论还应当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诸如:在政治层面上,有发展方向、发展目的、发展特征等;在动力层面上,有发展主体、发展保证、发展动力等;在涉及发展的具体环节上,有发展目标、发展方法、发展要求、发展道路等。由于实践处于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中,因而概念、范畴作为源于实践的认识“纽结”同样也处于动态的演进过程中,需要我们及时地进行理性提升。

以上关于科学发展观理论构架的设想,纯属个人看法。我们应通过深入的研究、探讨,充分展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



### 三、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体系性、全面性和开放性

科学把握与理解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实践中。

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为了确保这“四个自觉”真正落到实处,我们需要从思想认识上明确以下三点:

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体系性,防止把科学发展观理论“简单化”。一般说来,人们在谈到科学发展观时,总是十分自然地想到这四句话,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但千万不要忘记,虽然这四句话的确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或核心观点,然而我们却不能以此来替代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理解上,那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理论简单化了。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具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它既包含作为该理论体系核心观点的上述四句话,同时,又拥有其它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观点、论断、范畴,等等。只有把科学发展观理解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结合、理论体系和核心观点的交融,才能真正做到完整准确地掌握科学发展观。而只有依据这样理解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发展。

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在指导工作中的广泛性和全面性,防止把科学发展观“片面化”、“肢解化”。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的各方面。这就是说,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工作,不能仅仅囿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局部的、特殊的领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区间内,而应当将科学发展观对于实践的指导涵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过程。因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作用具有空间或广度上的普遍性与全面性以及时间上的长期性。用党的文献中的语言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需要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它是指导治党治国治军的思想武器和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行动指南。

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防止把科学发展观“终极化”、“凝固化”。应当说,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客观必然性。人们在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将已经形成的思想、观点变为现实,并接受实践对这些已经形成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验证;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将新鲜实践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上升,使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更充实、理论更丰富。由于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因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任何把科学发展观凝固化、终极化的想法,都是与人类认识发展的道路和规律相违背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的开放性还可以理解为它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虽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结构的层次性和理论内容的侧重点上有一定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确切地说,科学发展观应当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包容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增添新的理论内容。由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都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它们都是绝对真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由于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仅仅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因而它们又是相对真理,我们必须在新的实践中为理论的发展开辟道路。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这种开放性特征,我们就能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sup>[1]</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研究”(08 & 2D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戴群英